

# 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 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

曾向红 张峻溯

**内容提要：**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渐行渐远，呈现出偏离“欧洲化”的趋势。通过借鉴社会认同理论中有关身份地位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或可对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新的解释。本文以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作为自变量，重构了一个有关弱势身份群体面对强势身份群体的身份管理策略分析框架，并借此对冷战以来土耳其对欧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解释。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其身份管理策略经历了身份融入、身份护持、身份创造和身份竞争四个阶段。未来，在西方国家持续对土耳其施加新制裁，以及国内政治改革不断被西方国家否定的背景下，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将进一步强化身份竞争策略，其国家身份中的“泛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将会有更多的体现。

**关键词：**土耳其外交 欧盟 “欧洲化” 身份管理策略 社会认同

## 一 问题的提出

虽地接欧亚、面向中东，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其政治现代化进程，推进“欧洲化”（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进而实现“西方化”（跻身西方文明世界），被认为是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且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定向探索项目（项目编号：21zujbkdyx00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建议。此外，本文也得益于土耳其—德国大学埃内斯·巴伊拉克利（Enes Bayrakli）副教授和英国肯特大学助理讲师乌穆特·坎·阿迪森梅兹（Umut Can Adisonmez）慷慨提供的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之处均由作者负责。

耳其实现复兴目标唯一可行的道路。<sup>①</sup>这也是凯末尔主义思想指导下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根本方针。换言之,与欧洲国家关系攸关土耳其国家身份与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冷战至今,土耳其外交却呈现偏离“欧洲化”、回归“中东化”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在入盟问题上不断给土耳其设置障碍,引发其强烈不满,土耳其由此试图摆脱西方世界的“保护”与控制。<sup>②</sup>第二,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经济实力上升使得其外交自主性不断增强,后由于入盟谈判推进缓慢,其外交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偏移。<sup>③</sup>第三,2011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发现地区局势剧变中蕴含实现其大国雄心的地缘政治机遇,遂向中东地区投入更多外交资源。<sup>④</sup>第四,2015年后,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矛盾渐深,因此不再谋求与西方国家协调行动,而是试图在主动出击中实现战略利益的最大化。<sup>⑤</sup>

近年来,土耳其与欧洲国家间外交冲突不断。针对2016年发生的“7·15”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指责欧洲国家煽动国内叛乱,意图推翻现政府,甚至有意推动国家分裂。作为对欧洲国家忽视其核心利益的回应,土耳其在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上选择与欧盟渐行渐远。尽管总统埃尔多安一再表明“加入欧盟仍然是土耳其的战略优先事项”,<sup>⑥</sup>但土耳其的外交行为却与此背离:不仅在周边地区安全事务上积极出击,拒绝与北约盟国协调,而且与美欧西方盟友的外交关系也出现恶化的趋势,对欧洲国家的离心倾向愈益明显。2021年10月18日,土耳其与美法等十个西方国家围绕土耳其商人卡瓦拉(Osman Kavala)的问题,爆发新一轮外交风波。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土耳

① 参见[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5-136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现有国内外学者对土耳其“欧洲化”与“西方化”关系的考察,一般认为土耳其实现“欧洲化”与“西方化”的内涵是一致的,即都强调摆脱中东,融入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国家尤其是欧洲加强关系;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化”偏重强调土耳其融入西方世界的手段,“西方化”则是凯末尔对土耳其国家发展设置的根本目标。二者关系的论述参见李明明:《拒绝欧洲化?土耳其疑欧主义的兴起》,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第73-79页;Basak Alpan, “Europeanization and EU-Turkey Relations: Three Domains, Four Periods,” in Wulf Reiners and Ebru Turhan, eds., *EU-Turkey Relations: Theories,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107-128; Ayhan Kaya, *Europeanization and Tolerance in Turkey: The Myth of Tole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1-28; Nathalie Tocci, “Europeanization in Turkey: Trigger or Anchor for Reform?”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10, No.1, 2005, pp.73-83.

② Sabri Sayari,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Challenges of Multi-reg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4, No.1, 2000, pp.169-182.

③ 参见 Galip Dalay,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Davutoglu: Continuity vs. Rupture,”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p.5,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6/07/turkish-foreign-policy-davutoglu-continuity-rupture-160714100039252.html>, 14 July 2016.

④ 李秉忠:《“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52-54页。

⑤ 参见李游:《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内政外交的调整》,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2期,第75-81页。

⑥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坚定的入盟决心》,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2022年1月13日, <https://www.trt.net.tr/chinese/tu-er-qi/2022/01/13/ai-er-duo-an-qiang-diao-tu-er-qi-jian-ding-de-ru-meng-jue-xin-1762301>。

其与其西方伙伴的关系濒临崩溃的边缘”。<sup>①</sup>然而,就土欧关系发展的历史而言,欧洲国家既是土耳其对外经贸的重要合作伙伴,又是土耳其防务安全的主要盟友,且土耳其与欧盟在贸易安排、人员往来及欧洲一体化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sup>②</sup>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外交为什么会发生偏离“欧洲化”的转型?这是本文尝试解释的主要问题。

土耳其对外交政策的演变亦属于土耳其国家整体外交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下文将简要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土耳其外交转变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并尝试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以此对冷战后土耳其外交逐渐偏离“欧洲化”的原因做出初步解释。

## 二 对土耳其外交转变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针对土耳其出现的外交转型,国内外学者分析框架的构建主要基于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视角。前者强调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中自身实力的变化、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国际格局变化、国内政治变动,以及国家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后者则强调土耳其国家身份、意识形态、领导人话语及现代化进程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 (一)现实主义视角

土耳其地处欧洲与中东的战略要冲,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意味着区域或世界权力平衡的系统性变化都会对其内政及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sup>③</sup>因此,针对冷战结束前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学者尝试从国际结构变迁的角度寻找解释。如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呈现出的多极化趋势,使得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希望土耳其完全倒向对方。这为土耳其的独立行动创造了政策空间,而不必担心面临两极格局下选边站队的压力。<sup>④</sup>

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土耳其外交转型与其经济实力增长、全球性大国的夙愿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有着重要关系。<sup>⑤</sup>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土耳其外交更加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而贸易的增长为其实现区域

<sup>①</sup> 《土耳其与美欧裂痕加大》,人民网,2021年11月4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1104/c1002-32272858.html>。

<sup>②</sup> 《土耳其“入欧”心情仍很迫切》,人民网,2021年6月12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612/c1002-32129138.html>。

<sup>③</sup> Mustafa Aydin, “The Determinant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ey’s European Vocation,”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2, 2003, p.308.

<sup>④</sup>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p.1103.

<sup>⑤</sup> 胡雨:《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第49页。

大国的目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sup>①</sup>其二,中东变局后地区局势混乱,土耳其希望通过对地区危机采取军事干预的方式抵御危险因素的外溢,因而也更加强调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土耳其不得不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以免被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所粉碎”。<sup>②</sup>

除了体系层面的解释,对土耳其外交转型的研究也出现了分析层次回落的现象。一些学者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趋势,并认为在军方与民选政府争夺国家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可以迎合土耳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从而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奠定基础。<sup>③</sup>也有学者认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领导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国家的世俗体制与政治伊斯兰的两极分化,都导致土耳其外交决策难以做出理性选择,从而使得其外交行为发生激进化转变。<sup>④</sup>此外,中国学者李智育从领导人、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上台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sup>⑤</sup>西方学者则选择赫尔曼(Charles F. Hermann)构建的四种类型模式以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发展方向。<sup>⑥</sup>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诸多研究虽然强调了国家实力、国内政治、外部安全环境等因素对土耳其外交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土耳其外交为何转变”的可能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对相关因素进行类型化梳理,并未对土耳其外交政策为何转变这一问题做出系统回答。特别是近年来土耳其在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秩序重构问题上手段强硬、态度激进,其外交行为的活跃程度似乎超出国家实力所能支撑的范围。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外交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目标与实力之间的错位,致使该国屡次陷入外交危机。对于这一现象,基于现实主义的诸多研究似乎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 (二)建构主义视角

相比于现实主义视角在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问题上的局限性,建构主义视角基于

① 参见 Cengiz Dinç, “Turkey as a New Security Actor in the Middle East: Beyond the Slogans,” pp.62-64。

② Ziya Meral and Jonathan Paris, “Decod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yperactivity,” pp.76-80。

③ Ziya Öniş, “Multiple Faces of the ‘New’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lying Dynamics and a Critique,” p.62。

④ 参见 Nuri Yesilyurt, “Explaining Miscalculation and Maladaptation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Arab Uprising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6, No.2, 2017, pp.65-80。

⑤ 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9期,第55-70页。

⑥ 参见 Meliha B. Altunışık and Lenore G. Martin,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Vol.12, No.4, 2011, p.570; Burak Cop and Özge Zihni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AKP Rule: Making Sense of the Turbulence,”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5, No.1, 2015, pp.2-5。赫尔曼提出的四种分析模式主要包括:调整变更(Adjustment change)、程序变更(Program change)、问题/目标变更(Problem/goal change)、国际方向变更(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hange),参见 Charles F. Hermann, “Changing Course: 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Issue 1, 1990, pp.5-6。

“观念建构利益”的理论假定,将身份、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纳入考量范围。这一视角指明了国家身份界定利益和偏好,进而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动。<sup>①</sup>此外,立足于国家身份的解释还能关注到不同发展程度、区域和文明圈国家的特殊性。<sup>②</sup>就土耳其所处的现实情境看,位于欧亚两大洲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使土耳其同时面临东方与西方、世俗与伊斯兰、“泛突厥主义”与奥斯曼主义等多重身份的张力而无所适从。<sup>③</sup>因此,土耳其外交转型也被称为“身份之变”。<sup>④</sup>建构主义中对国家观念与身份因素的强调或将为研究土耳其外交转变提供更加多样的视角。<sup>⑤</sup>

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有明显不同的政治观念,统治精英的信仰程度、身份观念会导致国家出现相异的外交政策。<sup>⑥</sup>豪戈姆(Lars Haugom)认为,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南部库尔德分离主义的日渐兴起、伊斯坦布尔盖齐(Gezi)公园抗议及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等因素,使得土耳其政治精英对国内外的威胁认知发生了改变。2016年由葛兰运动(Gülen movement)所助推的未遂军事政变,更使正发党高层认为中东变局的余波或在土国内掀起新的政变。<sup>⑦</sup>鉴于此,正发党精英对国家政权面临威胁的不安感急剧增加,土耳其外交政策也由经济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sup>⑧</sup>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不稳定,甚至是激进化。

土耳其国家身份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外交行动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各类政治群体在商业、贸易、能源、宗教等领域具有不同的利益与偏好,土耳其具有“欧亚桥梁”“贸易国家”“欧盟候选国”“全球人道主义行动者”“区域能源中心国家”“民主伊斯兰国家”等多重身份,<sup>⑨</sup>糅合了“世俗的、宗教的、人性的、西化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226页。

② 周明、李嘉伟:《国家身份与欧亚地区抗争政治的变奏》,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105页。

③ 亨廷顿认为,土耳其将长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7页。无独有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中”,且受到来自现代主义(西化)、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的张力,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④ 唐志超:《身份危机与中东大变局》,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24期,第27页。

⑤ 参见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2-13页。

⑥ Bülent Aras and Aylin Gorener,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The Ideational Bases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2, No.1, 2010, p.75.

⑦ 参见 Lars Haugo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Erdogan: A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38, No.3, 2019, pp.213-214.

⑧ Ariel González Levaggi and Federico Donelli, “Turkey’s Changing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pp.1106-1107.

⑨ 参见 E. Fuat Keym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Arab Spring Era: from Proactive to Buffer Stat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Issue 12, 2016, pp.7-10.

的”等诸多政策取向,<sup>①</sup>这些因素成为土耳其在外交上“积极行动”的出发点。此外,土耳其身份的变化根植于中东变局与国内政治力量结构的剧烈变动,身份认同的反弹也会刺激执政党在内外政策上“用力过猛”,<sup>②</sup>从而显示出激进化的特征。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也使得正发党政府更加强调自身逊尼派伊斯兰身份,导致其在外交政策中出现了一种“适当性逻辑”。这种逻辑强调身份与意识形态因素的主导作用,致使土耳其的外交行为不再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而是基于伊斯兰政治和所谓“突厥民族”<sup>③</sup>的“责任或适当性”。<sup>④</sup>由此可见,土耳其外交实践中战略身份与现实身份的错位,导致其外交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且难以奏效。<sup>⑤</sup>

一些学者从建构主义方法论出发,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变。巴伊拉克利(Enes Bayraklı)尝试以土耳其政治观念由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向,解释土耳其外交指导方针由纯粹的凯末尔主义到战略纵深主义的转变,其研究涉及对全球化、冷战终结、伊斯兰政党兴起等因素的分析。<sup>⑥</sup>另一些学者则从批判建构主义<sup>⑦</sup>的方法论出发,通过对土耳其领导人的新闻、讲话、外交辞令的话语分析,解释土耳其积极的外交政策转型。巴斯坎(Birol Başkan)认为,正发党上台后,在时任总理首席顾问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影响下,土耳其外交政策借鉴了伊斯兰话语的解释框架,并且深受奥斯曼帝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这促使其外交出现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转向。<sup>⑧</sup>阿尔坎(Zeynep Arkan)等人则通过对达武特奥卢在2002—2016年间的话语文本进行分析后认为,达武特奥卢试图借助土耳其历史遗产和地缘环境的特殊性重塑土耳其

① 参见哈全安、周木情:《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9页。

② 李亚男:《土耳其国家身份的重塑及其政策影响》,载《土耳其研究》,2018年第1期,第59—61页;谢立忱:《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30—37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突厥汗国(552—745年)的灭亡,突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经消失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但突厥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则通过突厥化的方式流传至今,造就了许多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突厥语世界”或“突厥语国家”。土耳其等国宣扬的所谓“突厥民族”概念实际上是为其谋求政治扩张和实现大国目标服务的,参见张玉艳:《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5期,第45—46页。

④ Akam A. Ali,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Research*, Vol.2, No.1, 2019, p.15.

⑤ 苏闻宇:《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6期,第70页。

⑥ Enes Bayraklı,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The Emergence of Kantian Cultur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 Holist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Ph. D. Dissertation, Vienna: Universität Wien, 2012.

⑦ 相比于传统建构主义探讨身份观念等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批判建构主义探讨的则是外交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话语结构,参见 Zeynep Arkan and Müge Kinacıoğlu, “Enabling ‘Ambitious Activism’: Davutoğlu’s Vision of a New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for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17, No.3, 2016, pp.383—386.

⑧ 参见 Birol Başkan, “Islamism an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Arab Spring,” *Turkish Studies*, Vol.19, No.2, 2018, pp.1—18.

其的国家身份,并强调土耳其作为“区域积极行动者”的国际角色。<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批判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虽然对土耳其国家身份的塑造表达了合理关切,但其对身份的理解仅限于“话语中所表现的差异及其相关叙事”,<sup>②</sup>且批判建构主义重视解构而非建构,因而也忽视了传统建构主义中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身份塑造的影响。<sup>③</sup> 除此以外,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通常局限于某一领导人任职的固定时间段,无法对国家身份在时空维度的转换进行有效解释。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现代化进程亦被视为“后帝国”国家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也有学者尝试以此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国学者咎涛认为,土耳其有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困境:一方面,土耳其的民族化(民族国家建构)需要依靠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化又要否定这些历史传统而学习西方文明。因此,土耳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与建构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sup>④</sup> 基于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困境的考察,阿斯兰(Ali Aslan)指出,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对国际政治中现代性的标准进行调整,如从强调民族国家到强调民主政体。这导致土耳其在融入西方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并使其希望以激进的外交政策突破西方世界设下的既有限制。<sup>⑤</sup>

### (三)小结

自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开启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以来,土耳其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融入了西方文明的诸多因素。1856年《巴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获准加入欧洲协调并适用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国际法标准,这是土耳其一项长期战略——融入欧洲、获得欧洲身份——的开始。<sup>⑥</sup> 1923年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土耳其始终将加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不过,这一目标虽然适用于世界,但对土耳其而言却主要源自欧洲国家的影响。<sup>⑦</sup>

<sup>①</sup> Zeynep Arkan and Müge Kınacıoğlu, “Enabling ‘Ambitious Activism’: Davutoğlu’s Vision of a New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for Turkey,” pp.381-405.

<sup>②</sup> Ibid., p.384.

<sup>③</sup>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1, 1998, pp.171-200.

<sup>④</sup> 参见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19页。

<sup>⑤</sup> 参见Ali Aslan, “Problematising Modernity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dentity, Sovereignty and Beyond,”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Cilt: 9, Sayı: 33, 2013, pp.27-57.

<sup>⑥</sup>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30.

<sup>⑦</sup> 参见咎涛:《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以民族主义、独立革命与世俗化为例》,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第111页。

就此而言,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转型是外源型和植入型的,并非源自本土社会的内部需求,其目的是将土耳其融入欧洲政治发展的轨道。这说明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外部交往(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因素往往决定了其内部的变化。<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西化路线虽然被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逐渐修正,但正如前副总理巴伯江(Ali Babacan)所指出的:“加入欧盟是土耳其近二百年来所付出的追求现代化努力的最后阶段”。<sup>②</sup> 这足以表明,从19世纪加入欧洲协调到1952年加入北约,再到21世纪以来的入盟谈判,虽然其间土耳其对“欧洲身份”的认知存在倒退的趋势,<sup>③</sup>但从未真正放弃融入欧洲世界。地理、经济、文化和历史记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世界”始终是土耳其自我身份之外的显著“他者”;<sup>④</sup>欧洲国家对土耳其“欧洲身份”的承认、蔑视与污名,塑造了土耳其的外交行为与偏好。<sup>⑤</sup> 因此,欧洲国家与土耳其围绕身份承认与被承认、蔑视与反抗之间的互动,可以成为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综上所述,相比于现实主义视角下解释土耳其外交转型原因的局限,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于身份和国家观念因素的强调,极大地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不过,无论是传统建构主义对身份特征、国家观念因素的强调,还是批判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大多只强调土耳其国家身份与国家观念建构的内在性,忽略了“他者”对土耳其身份及观念建构的影响。国家身份在历史中形成,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故仅运用国家身份作为自变量有时难以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sup>⑥</sup>

因此,从国家身份特征或身份张力等角度考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相关研究,可能仅是对土耳其外交的诠释,而非对“土耳其外交为何转变”这一问题的解释。不过,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身份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从身份形成的角度看,个体自我持有的身份观念还需得到他者的承

① 参见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② Ali Babacan, “Living in Difficult Times,” *Turkish Review*, Vol.1, No.1, 2010, pp.16-20, quote from André Barrinha, “The Ambitious Insulator: Revisiting Turkey’s Position i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19, No.2, 2014, p.174.

③ 参见 Senem Aydın-Düzgüt, “De-Europeanisation through Discours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AKP’s Election Speeche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21, No.1, 2016, pp.45-58.

④ 个体对显著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认定及显著他者对个体行为塑造的影响,参见 Thomas Lindemann,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 pp.217-219;对土欧双方自我(Self)与他者(Other)关系的讨论,参见 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39-63.

⑤ Ayş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8.

⑥ 王志、王梅:《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探析》,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第145页。

认才能在社会中产生实在意义”,<sup>①</sup>这是因为身份的建构和变化具有主体间性。温特的论述表明,身份的形成需要经历自我建构和他者承认的互动过程才能实现。温特对身份形成过程中“互动”因素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身份在既有分析框架中强调内在性因素的局限,从而为本文解释框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 三 理论选择与解释框架的构建

#### (一)理论选择及其适用性

本文解释框架的构建将主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并在此基础上对身份管理策略中的相关变量进行重新界定,以使其符合可操作化的原则。社会认同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塔菲尔(Henri Tajfel)及其弟子图纳(John C. Turner)提出,最早出现于群体间行为及族群中心主义的相关研究中,旨在解释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在社会认同上的差异如何造就偏见、冲突等一系列群体间社会行为的现象。<sup>②</sup>

之所以选用社会认同理论作为本文解释框架构建的理论基础,原因有三:第一,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假定下,国家会关注其地位、身份的变化。<sup>③</sup>因此,社会群体会表现出对积极的社会地位与独特身份的追求,国家同样也具有对积极地位、自尊与身份承认的追求。<sup>④</sup>第二,大量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从奥斯曼帝国开始,土耳其便一直追求融入欧洲,并希望借助与欧洲国家关系的维持、促进国内的“文明化”与现代化。<sup>⑤</sup>这意味着在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是较强势的一方,土耳其则是较弱势的一方;二者之间体现出鲜明的国家身份边界的区隔,即文明与野蛮、世俗与宗教、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等。目前,土耳其仍未放弃加入欧盟,这也意味着土欧之间基于“土耳其能否成为‘欧洲国家’”这一问题的身份联系将继续存在。第三,土耳其融入欧洲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且欧洲国家一直将土耳其看作欧洲与非欧洲世界之间守门人(Gatekeeper)和欧

<sup>①</sup>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页。

<sup>②</sup>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5-476页。

<sup>③</sup>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页;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载《欧洲》,2001年第3期,第27-30页。

<sup>④</sup> 国家对承认的追求已经得到学界相当的重视,参见[美]理查德·内得·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8-61页;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67-75页;赵俊:《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语法:“为承认而斗争”》,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139页。

<sup>⑤</sup> 参见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41-43页。

洲文明的局外者(Outsider)。<sup>①</sup> 故土欧双方围绕身份追求与身份承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被视作社会认同理论中所描述的不同群体间的互动。除此以外,土耳其国家身份建构中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因素在先前研究中鲜有提及,而社会认同理论中对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行为的关注则突出了身份建构中的互动因素。因此,从社会认同理论出发考察土耳其外交偏离“欧洲化”的转型过程,或许能为我们解释该问题带来新的理论启发。

## (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启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以积极区分的原则强调内群体的优势地位,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与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形成群我意识。<sup>②</sup> 社会分类是指依据群体的不同特征,区分内外两种群体身份,并将自我意识赋予内群体,从而形成群体内部的相似性(我们都相同)与群体外部的差异性(我们与他们都不同),<sup>③</sup>这是社会认同形成的第一阶段。为了保持群体身份的优越性、增强群体内部自尊,群体成员倾向于将内群体身份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对自我的积极评价,这构成了社会认同的第二阶段,并使个体对认同的感觉更加真实。<sup>④</sup> 然而,群体之间通常存在着地位、权力和威望的巨大差异,这造就了群体间进行社会比较时存在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并促使不同群体在寻求自我认同时采用不同的策略。<sup>⑤</sup> 强势群体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巩固内群体身份和地位优势,凸显其优越性,以提升自尊;弱势群体则会通过保持与强势群体的身份联系,以维持或提高其社会认同。在此过程中,弱势群体往往会采取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和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三种身份管理策略。<sup>⑥</sup>

在弱势群体不断寻求与强势群体的身份联系以提高其社会认同的理论假定下,三种身份管理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关系性质的感知,并可用三组

<sup>①</sup> Ayş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pp.57-63.

<sup>②</sup> 这种“群我意识”源自不同群体对内外两种身份差异的区分,并会产生对内群体的偏好和外群体的歧视,以此提高内群体自尊,参见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s of Psychology*, Vol.33, No.1, 1982, pp.3-9.

<sup>③</sup> 参见 Matthew J. Hornse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A Historical Revie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2, No.1, 2008, p.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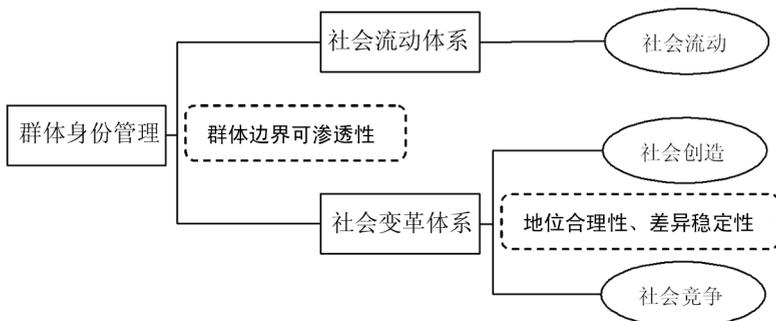
<sup>④</sup> *Ibid.*, p.207.

<sup>⑤</sup> Mi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Routledge, 1998, pp.48-49.

<sup>⑥</sup>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既有研究的分类,社会流动通常被归于社会流动体系(Social Mobility Belief System),而社会创造与社会竞争则被归于社会变革体系(Social Change Belief System),参见 Henri Tajfel,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Henri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cademic, 1978, pp.27-98, quote from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4, 2010, p.66.

关系变量加以区分: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sup>①</sup>、群体地位的合理性(legitimacy)与群体间差异的稳定性(stability)。<sup>②</sup>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高,即弱势群体有较大的可能性穿越群体边界并融入强势群体时,弱势群体通常会采取社会流动的身份策略;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低,但群体间关系被看作合理的且群体差异相对稳定时,弱势群体将会寻找新的身份维度或与更低一级的社会群体进行群体间比较,即社会创造;当群体间关系被看作不合理且群体差异变化大时,弱势群体往往认为自身处于不安全的情况下,从而导致两个群体发生激烈的直接冲突,亦即社会竞争。<sup>③</sup>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认同理论中群体身份管理的体系、策略及其分类



注:图由作者自制。

社会认同理论虽然揭示了群体间行为的动因及身份管理策略,并被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运用到了国际关系方法论、<sup>④</sup>国家地位寻求与身份管理<sup>⑤</sup>等问题的研究中,但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其一,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虽然明确了社会流动与社会变革两大体系之间的选择差异,但塔菲尔等人并未对社会变革体系下社会创造与社会竞争的具体策略选项进行明确的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过社会流动进入内群体

<sup>①</sup> 在此有必要区分群体边界的渗透性与可渗透性二者的区别。群体边界的渗透性强调内外群体间的客观差异与标准;可渗透性则更加强调弱势群体对穿越群体边界可能性的看法。

<sup>②</sup>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第477页。

<sup>③</sup> Mi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pp.48-51.

<sup>④</sup>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1995, pp.229-252.

<sup>⑤</sup> 参见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p.66;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Russia Says No: Powe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7, Issue 3-4, 2014, pp.269-279.

的策略选择是最优路径的理论假象。<sup>①</sup>其二,群体地位合理性与群体差异的稳定性之间存在难以分割的内生性关联。当弱势群体认为群体间地位分配不合理时,自然会寻求地位的变更,这也意味着群体差异的稳定性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对于社会变革体系下不同策略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仅凭群体地位合理性与群体差异的稳定性这两个变量难以进行合理澄清,故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重新界定。

### (三)解释框架的构建

针对社会认同理论中关于社会流动与社会变革体系下相关变量因素分析的不足,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需求出发,对其进行适当完善,以此构建本文的解释框架。

首先,对于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这一变量,塔菲尔等人认为,可渗透性的高低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流动体系与社会变革体系之间的选择。对于欧盟这类超国家主权实体来说,其边界范围与欧盟内部长时段形成的制度、法律以及成员规范有关;群体边界一旦确定,便具有独立于该群体成员之外的稳定性。<sup>②</sup>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这类主权实体的群体边界通常是确定的(即常量),衡量这类群体边界可渗透性高低的因素在于弱势群体(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对强势群体边界(欧盟扩员可能性)的感知。当弱势群体感知到群体边界的扩员信号时,弱势群体将会认为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反之,如果弱势群体感知到群体边界固化的信号或意识到融入强势群体的困难增加,则会认为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低,并最终导致弱势群体放弃社会流动的策略,转而在社会变革体系下寻求突破。除此以外,社会流动策略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改造自身身份过程中的承认或蔑视,这也体现了身份关系建构过程中自我持有信念与他者承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sup>③</sup>

其次,在社会认同理论中,塔菲尔和图纳将群体间地位的合理性定义为不同群体接受地位结构合法性的程度,而将地位差异的稳定性定义为实现群体地位替代的可能程度。基于此,他们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弱势群体是否采用社会竞争策略,取决于群体间地位结构是否被认为是不稳定和不合理的。<sup>④</sup>这样的理论假设会产生一个后果:在

<sup>①</sup> 参见 Marilyn B. Brewer,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86, No.2, 1979, pp.319-323.

<sup>②</sup> 虽然有学者发出“欧洲边界在哪里?”的疑问,但根据欧盟现行的法律规定,加入欧盟至少要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哥本哈根标准”中的全部要求以及视特定候选国而定的谈判框架的要求。特别是“哥本哈根标准”从技术层面限定了加入欧盟所必需的政治、经济与国内法标准。这足以说明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存在稳定且不易变动的边界。参见“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Enlargement Negotiations,”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nlargement-policy\\_en](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nlargement-policy_en).

<sup>③</sup>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页。

<sup>④</sup> 参见 B. Ann Bettencourt et al., "Status Differences and In-Group Bias: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tatus Stability, Status Legitimacy, and Group Permeability," *Psychology Bulletin*, Vol.127, No.4, 2001, p.521.

社会变革体系下,强势群体会认可并维护现有地位结构,因为这一结构对其提升内群体自尊更有利;而弱势群体则会因此而感受到来自不平等地位结构的歧视。<sup>①</sup> 为了消除歧视对内群体认同的不利影响,弱势群体会转向对自我身份进行改造。如果强势群体承认弱势群体在身份改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则意味着弱势群体社会创造策略的成功;<sup>②</sup> 否则,弱势群体将经历被蔑视的体验,从而导致其对现有地位结构的不满,并在原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与强势群体展开竞争,甚至爆发冲突。这是因为通过承认与蔑视的斗争(冲突)可以让主体间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性情感,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主体要求得到理解。<sup>③</sup> 由此可见,社会变革体系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所采取的承认或蔑视态度,决定了群体间地位结构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影响弱势群体采取社会创造抑或社会竞争策略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在确定强势群体所持态度对社会变革体系下弱势群体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后,我们仍需解决一个问题:在社会流动体系下,如果边界可渗透性高,但弱势群体仍然面临强势群体对其身份改造的蔑视,弱势群体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这一点在塔菲尔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现有研究认为,身份的蔑视必然意味着反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弱势群体身份的蔑视仍会招致反抗,只是激烈程度与被蔑视身份的显著性有关。<sup>④</sup> 不过,边界可渗透性高意味着弱势群体认为自身仍有极大可能实现群体边界的跨越,只是自我身份之改造尚未得到强势群体的认可。弱势群体仍会相信存在社会流动的可能,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持自我身份叙事的连续性,以维护本体安全,<sup>⑤</sup>其追求社会流动的行为将会变得格外谨慎。<sup>⑥</sup>

综上所述,通过对社会认同理论中身份管理策略三组变量的讨论与反思,我们从

<sup>①</sup> 参见 John C. Turner,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ty: Some Prospects for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5, No.1, 1975, pp.13-17。

<sup>②</sup> Mi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p.50。

<sup>③</sup>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sup>④</sup> 角色身份被蔑视后反应最激烈,其次是个体身份,最后是类属身份;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33-136页。

<sup>⑤</sup> 社会学中本体安全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认同连续性与物质环境恒常性之信心。个体对本体安全的需求,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7页。国家对维护自身本体安全同样非常重视,参见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p.341-370。

<sup>⑥</sup> 前景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禀赋效应,个体往往珍视既得收益而厌恶损失;当追求新收益的行为可能导致既有收益损失时,个体将会采取保守谨慎的措施,以维持现状。前景理论主要观点的论述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参见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5-108页;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7, No.2, 1996, pp.181-185。

中找到了两组关键的变量:其一,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或低);其二,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承认或蔑视)。吉登斯认为,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情境定位的互动,<sup>①</sup>因此身份及群体边界的互动都要处于具体的情境之下。由此,在原有社会认同理论的三种身份管理策略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分析国家身份管理策略,进而形成本文的四个理论假设(见表1):(1)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且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努力得到强势群体的承认时,弱势群体将会采取身份融入的策略,即放弃原有身份,全力使自身融入目标群体;(2)当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高,但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遭到强势群体的蔑视时,弱势群体出于维持自我身份延续性的需要,将会采取身份护持策略,即重视对已有身份的延续与保护,谨慎地追求目标身份;(3)当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低,但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得到强势群体的承认时,弱势群体将会采取身份创造策略,即与更低一级的群体进行比较或构建一种新的身份;(4)当群体边界可渗透性低,且弱势群体的身份改造遭到强势群体的蔑视时,弱势群体将采取身份竞争策略,即与强势群体进行竞争,甚至是发生冲突,以此彰显自我身份的独特性。

表1 身份管理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	
		承认	蔑视
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	高	身份融入	身份护持
	低	身份创造	身份竞争

注:表由作者自制。

下文将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对冷战以来(1945-2021年)土耳其与欧盟身份地位关系的变迁进行分析,以说明土耳其偏离“欧洲化”外交转型的基本历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四 重释土耳其对欧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

在运用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进行论述前,有必要对土耳其对欧外交的阶段划分及其依据进行必要说明。本文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对欧外交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可用三个关键节点加以区分。首先,以1991年冷战结束为标志,土耳其对欧洲国家在

<sup>①</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4页。

防务安全方面的战略价值下降,而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战略价值却在上升。因此,对比1991年前后两个时期,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入盟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其次,以2011年中东变局为标志,土耳其强势回归中东,西方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批评声音逐渐增多。因此,相比于2011年前土耳其积极推进入盟谈判及奉行与邻国“零问题”的谨慎外交,2011年后土耳其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发生明显变化,并开始与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地区展开权力角逐。最后,以2015年为界,之后的土耳其外交更加独树一帜,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非但未得到修复,反而进一步恶化。<sup>①</sup>如欧盟斥责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动是“民主倒退”,土耳其入盟进程停滞,土美、土欧关系恶化,矛盾凸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国外交的阶段性划分及其分界点有时会较为模糊,前后阶段之间的区分可能不会一目了然。鉴于此,当前土耳其对欧外交的阶段划分主要依据国内外学者们的基本共识,以及本文基于事态变化所做的观察和总结。

#### (一) 身份融入:地处中东的“欧洲国家”(1945-1991年)

早在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时代,土耳其国内普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可能有一种独立、现代而又与众不同的伊斯兰文明。‘文明,指的就是欧洲的文明’”。<sup>②</sup>因此,土耳其始终希望获得“欧洲国家”身份并实现“欧洲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对缓解国内经济困境的需求,土耳其迅速向美国靠拢,并希望得到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这一时期,土耳其国内主要是以军方、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凯末尔主义与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世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这两种政治力量虽然对国家道路的选择有所分歧,但都认同通过融入欧洲的方式实现“西方化”的目标。美苏冷战开始后,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土耳其坚定倒向西方阵营,并对北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sup>③</sup>1948年北约筹备成立时,土耳其就表明了加入的意愿,然而英美两国并未立刻将其纳入北约的联盟框架下。在英美等国看来,“土耳其既不属于西欧,也不属于大西洋”。<sup>④</sup>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苏冷战出现激化趋势,土耳其开始被视为“一个在西方联盟中可直接抵御苏联威胁”的国家,其“欧洲国家”身份被西方阵营国家所强调。<sup>⑤</sup>因此,当土耳其表示支持派遣联合国军入朝作战,并派出一个土耳其团后,遂于1952年5月成为北约成员国。

<sup>①</sup>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91页。

<sup>②</sup>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79-280页。

<sup>③</sup>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69.

<sup>④</sup> 参见 E. Athanassopoulou, “Western Defence Developments and Turkey’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194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2, No.2, 1996, p.101.

<sup>⑤</sup> Baskan Ora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1919-2006: Facts and Analyses with Documents*,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0, pp.494-495.

不过,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获得,仅仅是欧洲国家缓解冷战压力的权宜之策,而非对土耳其欧洲身份的真正接纳。从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看,将土耳其纳入北约一方面是应对苏联军事威胁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北约的政治吸纳给土耳其带来欧洲国家的“民主”,以此抵挡苏联意识形态的侵入。<sup>①</sup> 冷战期间北约成员国身份的获得,标志着土耳其被西方世界接纳为在军事和安全层面具有欧洲身份的新成员,并与欧洲国家形成了阶段性的安全共同体,其“欧洲化”的目标暂时取得突破。“在土耳其看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已经证明:他们(土耳其)最终被接受并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sup>②</sup>

冷战期间,除了在军事安全领域将土耳其纳入西方阵营,美欧也试图在经济领域吸纳土耳其。然而,由于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水平难以达到欧洲国家标准,这一过程颇为艰难,但土耳其对此仍存较高期望。1959年7月,土耳其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加入申请,并于1963年9月签署《安卡拉协议》(The Ankara Agreement)。这标志着土耳其与欧洲国家确定了以建立部分商品关税联盟为目标的贸易关系。《安卡拉协议》虽然明确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为土耳其敞开大门,但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只是为土耳其“经济入欧”制定了愿景规划。不过,土耳其政治精英却对这份协议大为赞赏,并认为协议的成功签署等同于欧洲国家再次确认了土耳其的西方身份。<sup>③</sup> 在《安卡拉协议》谈判期间,欧洲国家表现出的两种现象也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心:其一,出于对西方意识形态扩散的支持,多数西欧国家媒体对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表示赞许;其二,1959年8月,时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埃哈德(Ludwig Erhard)访问土耳其,在与时任总理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会谈时,承诺将尽全力确保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sup>④</sup>

然而,有关“经济入欧”的谈判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土耳其仍未能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仅在关税、贸易等方面与欧洲建立了临时性的互惠联系。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自1961年以来,土耳其国内平均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尤其是1980年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夫伦(Kenan Evren)发动的军事政变使得欧洲国家对其民主制度产生疑虑,土耳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程中中断;其二,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招致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使得欧洲国家暂缓发展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不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打破了苏联与西方阵营出现的缓和趋势,由于身

① Baskan Ora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1919-2006: Facts and Analyses with Documents*, pp.326-327.

② Yücel Bozdağlıoğ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Routledge, 2003, p.61.

③ 参见 Özge Zihnioglu, *EU-Turkey Rel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Depoliticization*, Routledge, 2020, p.26。

④ 参见 Baskan Ora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1919-2006: Facts and Analyses with Documents*, p.496。

处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欧洲人再次意识到土耳其在抵御苏联威胁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sup>①</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欧洲国家对土国内政治弊端采取容忍态度,无论是民选政府还是军政府当选,西方世界都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欧洲国家”。

综上所述,由于在冷战期间面临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为确保土耳其不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追求“欧洲身份”的诉求采取了承认的态度——在政治上将土耳其纳入北约的联盟体系、在经济上展开与其建立关税联盟的谈判。尤其是《安卡拉协议》的签订使土耳其意识到,一旦满足加入相关条件,就可能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sup>②</sup>因此,历届土耳其政府对中东及周边地区事务大多采取中立和克制态度,继续奉行“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并着力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确保能如期加入欧共体。即便北约在土塞冲突中对土耳其颇有微词,但土耳其政府仍然积极谋求与欧共体的防务一体化。这些做法表明,土耳其“从未打算修改他们对北约的最初看法和态度”。<sup>③</sup>1981-1986年,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仍处于“经济入欧”谈判层面的土耳其看到欧共体扩员的政治机会,遂于1987年向欧共体提出了加入的申请。然而直至1989年,这一申请才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正式回应。由于恰逢东欧剧变,欧共体的注意力集中于东欧地区,故土耳其加入欧共体的事宜“被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期,理由是土耳其国内混乱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由于塞浦路斯冲突而与希腊的关系存在问题”。<sup>④</sup>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融入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

表2 土耳其采取身份融入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承认	可渗透性: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952年取得北约成员国身份</li> <li>• 美欧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在西方联盟中可直接抵御苏联威胁”的国家<sup>⑤</sup></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963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安卡拉协议》,逐步建立关税同盟</li> </ul>
策略:身份融入	

注:表由作者自制。

## (二)身份护持:“欧亚桥梁”与中东事务的参与者(1992-2010年)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土耳其在冷战期间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作用不复存在。对

① 参见 Senem Aydın-Düzgüt and Nathalie Tocci,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4。

② 参见 F. Stephen Larrabee and Ian O.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RAND Corporation, 2003, p.46。

③ Yücel Bozdağlıoğ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p.61。

④ Baskan Oran,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1919-2006: Facts and Analyses with Documents*, p.580。

⑤ Ibid.

于欧洲国家来说,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冷战后期,南欧三国加入欧共体使得“欧洲身份”的属性发生变化,并促使欧共体更加强调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法治的重视。<sup>①</sup>因此,当1987年申请加入欧共体时,土耳其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更加重视“民主”的“新欧洲”。然而,土耳其基本没有注意到欧共体在扩员政策上重心的转变,相反,其继续强调加入欧共体的经济方面的因素。<sup>②</sup>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土耳其加入欧共体(欧盟)的努力遭到欧洲国家的蔑视。

从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峰会到1997年卢森堡峰会,土耳其均未能如愿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这加剧了其失衡心理。在此时期,欧盟先后承认了原苏东地区国家的候选成员国地位,并对欧盟扩员条件增加了“稳定的民主、维护法治、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限制。土耳其认为:“这些(原苏东地区)国家几年前还处于敌对国家的阵营中,且国家经济发展指标明显低于土耳其。”<sup>③</sup>因此,欧盟对土政策造成土耳其的强烈不满。时任副总理耶尔马兹甚至威胁,如果欧盟不改变态度,土耳其将撤销其入盟申请。<sup>④</sup>面对欧洲国家对土耳其融入欧洲进程的蔑视与否定,时任总统厄扎尔(Turgut Özal)认为:“土耳其的国家身份有两个维度,即东方和西方。土耳其这两个同样强大的身份维度必须结合起来,其中一个身份的实现不应该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土耳其应该是东方和西方都不可或缺的力量”。<sup>⑤</sup>厄扎尔的这一表态,重申了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应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这可以理解为土耳其在追求“欧洲国家”身份未果后,对自身原有“桥梁国家”和“欧亚国家”身份的保护与延续,亦成为正发党政府上台后重新经略中东及高加索地区的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思想的前奏。

不过,在否决土耳其的入盟申请后,欧盟仍然为其未来加入留存了可能性。例如,1995年欧盟与土耳其签订《关税同盟条约》,在经济一体化方面肯定了土耳其自厄扎尔政府以来所施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召开,土耳其不仅受邀与会,而且获得了欧盟候选成员国的资格。通过这次峰会,欧盟再次明确了土耳其融入欧洲的可能性,并愿意为土耳其提供与其他候选国平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sup>⑥</sup>欧盟在世纪之交重申土耳其入盟的可能性,促使土耳其在21世纪初仍然按照入盟的既定目标行事。2001-2005年间,土耳其议会针对欧盟的要求进行两次大规模

① 参见汪波:《伊拉克战争前后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关系的发展变化》,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54页。

② F. Stephen Larrabee and Ian O.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49.

③ Ibid., pp.50-51.

④ 参见王泽平:《试论冷战后土耳其的欧盟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第62页。

⑤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121.

⑥ 参见张健:《试析欧盟对土耳其政策的矛盾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第9页。

的修宪,并批准了七套涉及政治民主化与人权问题的制度性改革措施,<sup>①</sup>不过这仍未达到欧盟的预期标准。

欧盟为土耳其入盟进程设置的严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耳其对“欧洲化”态度的转变。2002年底召开的欧盟首脑峰会指出,入盟的正式谈判只会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才会开始。自2002年起,欧盟委员会定期针对土耳其改革的进展情况发布《土耳其加入欧盟进展报告》,<sup>②</sup>对土耳其人权、民主状况等问题进行批评,以此延后其入盟进程。与此同时,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获得单独组阁权。面对欧盟对土耳其入盟谈判的一再拖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虽然明确表示将在任期内全力推进改革,确保如期开展入盟正式谈判,但正发党治下土耳其的外交话语逐渐开始发生转变,这主要体现为:土耳其谋求“欧洲化”的话语表述由“加入当代(欧洲)文明”转向“(奥斯曼与欧洲)文明的联盟”。<sup>③</sup>这种转变反映了土耳其认为奥斯曼文明加入欧洲文明是对后者的完善与发展,而非简单的融入与被同化,同时也凸显了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正发党治下土耳其身份特征的界定首先是基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明,其次才是追求“欧洲国家”身份。

相比于先前土耳其政府对欧洲身份的执着追求,正发党主导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体现出强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奥斯曼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这既是对厄扎尔时代外交路线的继承,也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奥斯曼主义”色彩。<sup>④</sup>二者都表明土耳其对自身已有身份属性的保护与延续,亦即身份护持。因此,在入盟谈判推迟和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下,土耳其开始重新强调欧洲与中东之间的“桥梁”身份,并表现出主动发挥自身影响力介入地区事务的强烈意愿。换言之,面对入盟进程受阻,土耳其认为,“在积极行动中,中东与欧洲之间的中介身份将能够转化为一种无形的外交资产,并为土耳其扩大其区域影响力提供新的机会”。<sup>⑤</sup>不过,这一时期土耳其对入盟谈判前景仍然比较乐观,希望通过重拾“桥梁国家”的身份确保其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sup>⑥</sup>以实现“欧洲化”的目标。正如达武特奥卢所言:“土耳其开展积极外交

① 李乐曾:《欧盟决定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述评》,载《德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页。

② 上述报告参见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8c51f03-fc60-450a-9fbf-8516459c865f>。

③ Hasan Kösebalab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slam,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193.

④ 参见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2, No.6, 2007, pp.946-947。

⑤ 参见 Bahar Rumelili, “Turkey: Identity, Foreign Policy, and Socialization in a Post-Enlargement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3, No.2, 2011, pp.243-246。

⑥ Tarik Oğuzlu, “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Does Turkey Dissociate from the West?” *Turkish Studies*, Vol.9, No.1, 2008, pp.7-11.

的最终目的是要与西方国家在发展外交关系时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sup>①</sup>2002-2010年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虽然凸显原有“奥斯曼主义”的一些特征——积极介入西巴尔干、高加索、中东等地区事务,但总体而言仍较为谨慎,主要表现为与周边邻国发展关系和在地区争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例如与希腊就北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广泛协商、与中东地区叙利亚等国开展水资源合作、与宿敌亚美尼亚和保加利亚谋求关系正常化,以及在巴以冲突、俄格冲突中的调停斡旋等。

身份护持策略下外交政策重心的转变虽然实现了土耳其外交多维度、多样化的发展,并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中东事务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部分中东国家的好感,但却导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战略东移”的怀疑。<sup>②</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排斥,从而使土耳其“欧洲化”进程再度受挫。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护持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3所示。

表3 土耳其采取身份护持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蔑视	可渗透性: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入盟标准由重视经济因素改为强调“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因素<sup>③</sup></li> <li>• 在入盟谈判中将土耳其与原苏东地区国家区别对待<sup>④</sup></li> <li>• 西方对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质疑<sup>⑤</sup></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1995年土欧双方签订《关税同盟条约》</li> <li>• 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给予土耳其候选成员国身份</li> <li>• 2005年欧盟正式开启土耳其入盟谈判</li> </ul>
策略:身份护持	

注:表由作者自制。

### (三) 身份创造:“民主样板”与地区领导者(2011-2014年)

2005年,虽然欧盟与土耳其正式开启了入盟谈判,但法德两国保守政府的先后执政使得欧盟内部反对土耳其入盟的声音加大,故2007-2010年间土欧双方谈判进展缓慢。在谈判过程中,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充满敌对情绪,<sup>⑥</sup>促使土耳

<sup>①</sup>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10, No.1, 2008, p.96.

<sup>②</sup> 郑东超:《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载《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期,第7页。

<sup>③</sup> 参见汪波:《伊拉克战争前后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关系的发展变化》,第53-58页。

<sup>④</sup> 参见F. Stephen Larrabee and Ian O.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p.45-51。

<sup>⑤</sup> 参见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16, No.3, 2015, pp.291-309。

<sup>⑥</sup> 参见Rabah Aissaoui, “Histo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the Issue of Turkey’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French National Press,”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9, No.1, 2007, pp.10-14。

其不得不重新反思“土耳其真的是欧洲人吗?”这一问题。<sup>①</sup>除此以外,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国内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的指责更加激怒了正发党政府,并导致正发党精英对欧盟的认知逐渐恶化。例如在该党的官方话语中,欧盟被描述为“土耳其政治的入侵者”和“本质上具有歧视性的政治体”。<sup>②</sup>与此同时,土耳其民众中对于欧盟的认知也出现倒退的趋势。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一些土耳其人认为“欧洲人是现实且自私的,我们是一个优先考虑某些道德价值观和重视所有公民的国家。我们有一个更文明、更自由、更好的社会”。<sup>③</sup>正发党精英和土耳其普通民众对欧盟认知的倒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对加入欧盟的期待降低。

不过,由于多年来入盟谈判及国内政治民主化改革,土耳其已经与西方世界建立了相当多的制度性联系,因此也被视作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的延伸。<sup>④</sup>部分西方媒体甚至将土耳其盛赞为一个“有效地整合伊斯兰教与民主,且经济充满活力的样板”。<sup>⑤</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对土耳其政治改革成效的认可,也是对“温和伊斯兰民主”制度与“土耳其模式”的承认。

2011年中东变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在入盟希望渺茫且国内对欧洲身份认知倒退的情况下,土耳其开始借助中东变局为其标榜新的大国身份,即进行身份创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凭借与西方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联系,面向中东伊斯兰世界鼓吹“土耳其模式”的优越性;<sup>⑥</sup>其二,外交政策“向东看”,在中东、中亚及高加索等地区加大外交介入。前者是为了巩固自身中东“伊斯兰民主国家”的身份,后者则是为了确立在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世界中的“领导者”身份。

相比于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土耳其一直认为自己离欧洲更近,也更具有国家制度的先进性。因此,中东变局开始后,土耳其最初表示支持并将其看作中东人民为各自国家追求良治所做的努力。时任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甚至认为“‘阿拉伯之春’将有利于结束冷战残留在中东地区的旧秩序,并与当今主流世界观产生共鸣”。<sup>⑦</sup>正是

<sup>①</sup> Svante E. Cornell, “What Drive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19, No.1, 2012, p.17.

<sup>②</sup> 参见 Başak Alpan, “From AKP’s ‘Conservative Democracy’ to ‘Advanced Democracy’: Shif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bate on Europe,”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21, No.1, 2016, pp.15–28.

<sup>③</sup> 参见 Senem Aydın-Düzgün, “Foreign Policy and Identity Change: Analysing Perceptions of Europe among the Turkish Public,” *Politics*, Vol.38, No.1, 2018, p.29.

<sup>④</sup> Katerina Dalacoura,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ower Projection and Post-Ideologic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pp.1128–1129.

<sup>⑤</sup> Landon Thomas, “In Turkey’s Example, Some See Map for Egypt,”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2/06/world/middleeast/06turkey.html>.

<sup>⑥</sup> “土耳其模式”包含西方民主制度与伊斯兰传统的融合、经济多元化与全球化、适时追求区域领袖目标这三层内涵,不过其“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政治内涵是土耳其模式的核心。参见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1–144页。

<sup>⑦</sup> 参见 Bülent Aras, “Davutoğ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p.408.

基于对中东变局的积极看法,土耳其试图将自身确立为“中东新秩序的建立者”,并在中东地区推广所谓“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以帮助中东国家实现所谓的“民主化”。中东剧变后,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先后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访问,致力于在这些国家内部发展“土耳其模式”、推广“土式民主”。为了巩固中东地区“民主样板”的国家身份,土耳其甚至认为“为了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零问题’外交应该符合民主国家的价值观”。<sup>①</sup>因此,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一改之前对巴沙尔政府的温和态度,开始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批评,并敦促巴沙尔推进民主化改革,与叙利亚反对派实现权力共享。土耳其对叙外交政策的转变导致2002年以来逐渐缓和的土叙关系再度恶化,有关库尔德人问题逐渐上升为两国间的主要矛盾,并使土耳其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面临分离主义的危险。

入盟谈判进程受阻后,土耳其外交中的“怀旧”因素更加明显,更为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和宗教元素。<sup>②</sup>通过强调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纵深与地理纵深,时任外长达武特奥卢认为可以借此创造世界上与众不同的文明,从而确立土耳其“全球性大国”的身份。<sup>③</sup>达武特奥卢还声称:“土耳其同时是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海湾和黑海国家。土耳其的目标并不在于仅维持自身的发展与稳定,更要为其邻国和周边地区提供安全和稳定。”<sup>④</sup>在经历长期徘徊于欧洲体系边缘的窘境后,土耳其自身实力的上升更加令正发党外交决策者决心向东方转变,这被认为是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回归。<sup>⑤</sup>除此以外,土耳其不仅在中东先后扶植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的逊尼派伊斯兰势力,以彰显其“逊尼派领导者”的宗教身份,还在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大肆鼓动“泛突厥主义”,不断加强突厥语国家的团结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所谓的“突厥民族认同”。2011年突厥语国家阿斯塔纳峰会召开,土耳其企图通过修纂历史教科书的方式重塑中亚国家的“突厥民族”认同,俨然一副“突厥民族领导者”的政治姿态。由此可见,中东变局后推广“土耳其模式”、鼓噪“泛突厥主义”已经成为埃尔多安与达武特奥卢主导下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越来越多地当作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和中东地区实现身份创造的工具。

然而,随着中东变局的失控,土耳其所希冀的民主化改革逐渐被中东地区此起彼

<sup>①</sup> Min Wei,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Syrian Crisis: Dynamics of Transformation,”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13, No.3, 2019, p.7.

<sup>②</sup> M. Hakan Yavuz,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Die Welt Des Islams*, Vol.56, No.3-4, 2016, p.443.

<sup>③</sup> Aaron Stein,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Davutoglu, the AKP and the Pursuit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 2014, p.2.

<sup>④</sup>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77.

<sup>⑤</sup> 侯艾君:《“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载《社会科学学文摘》,2016年第7期,第26-28页。

伏的抗议浪潮所掩盖,甚至呈现出与欧亚地区“颜色革命”相似的特征。<sup>①</sup> 2013年5月,盖齐公园爆发反对埃尔多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土耳其军警随即镇压,此举立刻招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人权和国内政治的新一轮攻击。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即被冻结,与欧盟的关系也再次陷入低谷。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内局势的失控使得土叙边境库尔德人武装力量逐渐壮大,库区武装不但借助打击“伊斯兰国”势力获得来自美国政府的援助,还重新鼓动土耳其南部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这使得土耳其认为,中东变局下其同时面临政权颠覆、库尔德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这三重威胁,并将支持库尔德人武装的美国政府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sup>②</sup>

综上所述,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希望实现其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突厥语国家这三个层面的领导者身份,进而借助中东变局实现地区体系的重构。起初,土耳其领导者身份的创造主要依靠与欧洲长期存在的制度性联系,包括支持中东变局、推进“温和伊斯兰民主”等;然而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事件导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政治的干涉加剧,特别是欧盟冻结入盟谈判在事实上宣告土耳其近十年国内改革的失效。在获得“欧洲国家”身份的努力被不断蔑视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自身战略目标和身份叙事的连续性,土耳其不得不暂缓入盟谈判框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并着手进行有利于国家身份建构的政治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内伊斯兰化的复兴和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兴起。<sup>③</sup> 同时,这也意味着西方世界与土耳其国家身份的边界更

表4 土耳其采取身份创造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承认	可渗透性: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西方在中东变局中将土耳其视作“有效地整合伊斯兰教与民主,且经济充满活力的样板”</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入盟谈判进展缓慢<sup>④</sup></li> <li>• 法德两国保守派政府执政,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声音加大</li> <li>• 土耳其国内对欧洲认知出现倒退<sup>⑤</sup></li> </ul>
策略:身份创造	

注:表由作者自制。

<sup>①</sup> 周明、李嘉伟:《21世纪初两次国际抗议浪潮的关联与比较——兼论作为中介的吉尔吉斯斯坦“革命”》,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第98-103页。

<sup>②</sup> 参见 Meliha Benli Altunışık, “The New Turn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Domestic Insecurities,”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IAI) Paper, July 2020, p.5。

<sup>③</sup> 参见 Gareth Jenkins,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Running West, Heading East?*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215-216。

<sup>④</sup> 李明明:《拒绝欧洲化? 土耳其疑欧主义的兴起》,第73-74页。

<sup>⑤</sup> 参见 Başak Alpan, “From AKP’s ‘Conservative Democracy’ to ‘Advanced Democracy’: Shif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bate on Europe,” pp.15-28。

加清晰且逐渐固化,土耳其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做法凸显其国家身份的“领导者”特征。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创造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4所示。

#### (四) 身份竞争:与欧洲疏离的“新土耳其”(2015-2021年)

2014年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获胜,为其实现政治抱负扫清了障碍。2015年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但未能回归正轨,反而更加恶化。特别是2016年发生的“7·15”未遂军事政变,正发党政府认定西方国家借助葛兰运动意图实现土耳其政权更迭,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关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sup>①</sup>随后,埃尔多安以此为理由在军队和政府内部开展肃清行动,并将葛兰运动等反对派群体清除出国家政权,从而加强了对国内社会政治领域的掌控。“7·15”军事政变的失败也使正发党政府对土耳其军队的控制得以加强,这为埃尔多安在国内推动“伊斯兰化”提供了政治上的激励。<sup>②</sup>2017年4月,土耳其通过有关修改宪法的全民公投,正式将政治制度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并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

针对2016年“7·15”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治的变动,欧盟国家指责土耳其出现“民主的倒退”,已经不符合欧盟候选成员国的标准。2018年总统选举后,土耳其完成向总统制的转变;次年2月,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随即通过一项报告,对土耳其社会自由与民主法治等方面进行指责,建议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继续暂停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并交由欧洲议会进行表决。<sup>③</sup>

这一时期,希腊债务危机的扩散、欧洲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土耳其认识到欧盟内部在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方面的严重分歧,且土耳其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获得亦成为欧盟内部宪政僵局中辩论的焦点。这些因素不断向土耳其传递负面信号,更加弱化了土耳其推进“欧洲化”的渴望。<sup>④</sup>通过国内的政治肃清行动,埃尔多安基本扫清了反对派势力,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地位。尤其是国内自由主义世俗派和军队中的凯末尔主义者,基本都在“7·15”军事政变失败后被逐出政治舞台。因此,相比于先前土耳其国内世俗与伊斯兰两派力量势均力敌的状况,2016年之后的两派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以正发党为代表的所谓“温和伊斯兰主义”群体占据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主流。这被认为是

<sup>①</sup> 参见李云鹏:《浅析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新变化》,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1期,第89页。

<sup>②</sup> Ariel González Levaggi and Federico Donelli, “Turkey’s Changing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South,” pp. 1106-1108.

<sup>③</sup> 《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再生龃龉》,新华网,2019年2月2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25/c\\_1210066731.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25/c_1210066731.htm)。

<sup>④</sup> Ziya Öniş and Şuhnaz Yılmaz,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Asianism: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urkey during the AKP Era,” *Turkish Studies*, Vol.10, No.1, 2009, pp.14-17.

土耳其国内长久以来“凯末尔主义治国”思想的终结。<sup>①</sup>由此可见,在正发党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国家身份中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成分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温和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国家身份驱使下,凯末尔确立的“欧洲化”原则对土耳其国家身份的构建似乎不再重要,而埃尔多安主导下的“伊斯兰化”成为更重要的身份标签。土耳其也势必要显示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行为与身份特征,并对后者产生戒备甚至是敌对的心理。因此,当欧盟再次以制裁威胁试图规约土耳其偏离西方的外交行为时,其作用已经不再明显。<sup>②</sup>

同时,土耳其国家身份“伊斯兰化”的国际大背景是西方国家插足中东事务后所导致的中东乱局,特别是美国扶植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对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极为严峻的威胁。一方面,经过中东变局的角逐,土耳其并未扶植起属于自己的逊尼派力量,在与沙特和伊朗等老牌中东强国的竞争中仍然无法占据全面优势,这也导致土耳其实现中东地区领导者身份的愿望受损;另一方面,难民的涌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外溢、库尔德分离主义及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都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战略转圜的余地不断缩小,并再次激发国内既有的“色佛尔恐惧症”(Sèvresphobia)<sup>③</sup>,即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忧。对土耳其而言,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西方国家对其“欧洲国家”身份的认可。<sup>④</sup>然而,当诸如北约、欧盟等曾经专属于西方国家的组织变为一个全球性或泛地区性的组织后,这些国际组织带给土耳其的认同感下降,土美关系的恶化也使土耳其在安全领域断绝了原有国家安全的保护来源。这些变化都导致了土耳其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国家行为既受到安全因素的驱使,显示出“安全化”的特点,例如发动幼发拉底河之盾等四次越界军事行动,打击叙伊边境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又受到土耳其日益凸显的伊斯兰身份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彼此对立的影响,显示出在中东地区与西方不一致甚至是背向而行的特征,例如土美关系因引渡居伦问题恶化、在难民问题上与欧盟国家失去协调。<sup>⑤</sup>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本国安全,更是为了显示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外交

<sup>①</sup> William Gourlay, *The Kurds in Erdoğan's Turkey: Balancing Identity, Resistance and Citizenship*,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p.30.

<sup>②</sup> 《埃尔多安不在意欧盟制裁威胁》,新华网,2020年12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12/10/c\_1210924928.htm.

<sup>③</sup> 一些学者将“色佛尔恐惧症”解释为一种“被试图摧毁土耳其国家的敌人包围”的感觉,这源于奥斯曼帝国衰落后,西方列强瓜分土耳其的历史记忆,参见 Dietrich Jung, “The Sevres Syndrom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Its Historical Legacy,” in Bjorn Muller, ed., *Oil and Water: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I.B. Tauris, 2001, pp.131-159.

<sup>④</sup> Tarik Oğuzlu, “Soft Power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 1, 2007, pp.84-86.

<sup>⑤</sup> 参见 Nefise Ela Gökalp Aras, “A Game Changer in EU-Turkey Relations: The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 of Migratio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4, No.4, 2019, pp.47-61.

政策,并借以凸显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

可以预见,在西方对土耳其的蔑视不断加剧、土耳其对欧盟成员国身份认知出现倒退的情况下,土耳其的外交行为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其外交偏离“欧洲化”的转型也会更加明显。这既是对外部威胁的回应,也是为了在摆脱欧洲国家束缚后,实现本国地区领导者乃至“全球性大国”的身份目标。特别是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不再面临国内世俗派力量的掣肘,将更能促使正发党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落在实处。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受到大国宏愿驱使的土耳其还可能将“D-8”组织<sup>①</sup>、“突厥国家组织”、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当作彰显自己大国身份的抓手,这都是土耳其意图与美国和西方、俄罗斯、中国进行身份竞争,强调其“全球性大国”身份的行为表现。这段时期土耳其身份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如表5所示。

表5 土耳其采取身份竞争策略的影响因素

态度:蔑视	可渗透性: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欧盟指责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动是“民主倒退”<sup>②</sup></li> <li>• 西方国家扶植库尔德势力</li> <li>• 美国煽动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国内发动政变</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欧盟内部出现宪制危机,欧洲一体化显现巨大的不确定性<sup>③</sup></li> <li>• 土耳其国内政治伊斯兰化的趋势使其与欧洲国家的身份边界更加明晰<sup>④</sup></li> </ul>
策略:身份竞争	

注:表由作者自制。

## 五 结语

本文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尝试以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和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作为核心变量,构建解释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的理论框架。相比于现有研究中以土耳其国家身份的特征、张力等静态因素分析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的局限性,本文从土耳其国家身份管理策略出发,通过考察冷战以来土耳其“欧洲化”过程中与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的关系变化,突出了

<sup>①</sup> 即“伊斯兰发展中国家八国集团”,该组织在土耳其前总理埃尔巴坎倡导下建立,主要包括埃及、伊朗、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个国家。

<sup>②</sup> 参见 European Parliament, “Future EU-Turkey Relations,”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90/EPRS\\_BRI\(2018\)628290\\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90/EPRS_BRI(2018)628290_EN.pdf)。

<sup>③</sup> 沈孝泉:《欧盟“生存危机”与西方制度困境》,载《求是》,2017年第4期,第57-59页。

<sup>④</sup> 参见 Gareth Jenkins,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Running West, Heading East?* pp.111-139。

土耳其与欧洲国家在身份建构过程中互动因素的重要性。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帝国灭亡后,(土耳其)共和国虽然确定其目的,但却不确定其身份。”<sup>①</sup>本文力图说明,欧盟对土耳其追求“欧洲国家”身份所持态度的变化和土耳其对自身“欧洲国家”身份认知的变化,共同导致了当前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外交转型。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分别采取了身份融入、身份护持、身份创造和身份竞争四种不同的国家身份管理策略。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欧洲一体化面临诸多困境,西方国家对土指责和制裁行为仍出现扩大化的趋势。在西方国家持续施加新制裁、<sup>②</sup>土耳其国内政治改革被不断否定<sup>③</sup>的情况下,土耳其将进一步强化其身份竞争的策略选择,并显示出自身所具有的“泛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就国内形势而言,现阶段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离并逐渐偏离“欧洲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土耳其国内以正发党为首的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对凯末尔主义的“反叛”。特别是正发党政府对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刻意引导,可能导致土耳其社会中压抑已久的政治伊斯兰思潮出现强化态势,进而使民众对欧洲国家及“欧洲化”议程的认知发生颠覆性变化,并再度加深土欧关系的既有矛盾。需要指出,土耳其偏离“欧洲化”并不意味着其会终止“欧洲化”。就目前而言,土欧关系仍将围绕土耳其“欧洲国家”身份问题发生变迁。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用以解释土耳其冷战以来外交政策演变的理论视角,并对其偏离“欧洲化”进程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做了初步解释。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原因及其发展方向。然而,文章还存在一些不足:就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而言,虽然指出了四种身份管理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完善了原有社会认同理论中有关社会流动、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三种身份管理策略在变量划分上的不足,但并未对身份管理策略的选择、变更、触发和演进等机制进行详细说明,这可能导致理论框架内部假设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清晰。此外,本文虽然尝试通过对冷战以来土耳其对欧政策变迁的分析以确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受制于身份构建与身份策略判断的主观性及文章的篇幅,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只是初步尝试,仍有待未来的研究予以更明确的验证。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② 《土耳其与欧盟渐行渐远》,人民网,2020年7月1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714/c1002-31782725.html。

③ 参见《土耳其对欧盟报告表示不满》,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2021年10月21日,https://www.trt.net.tr/chinese/tu-er-qi/2021/10/20/tu-er-qi-dui-ou-meng-bao-gao-biao-shi-bu-man-1722265。